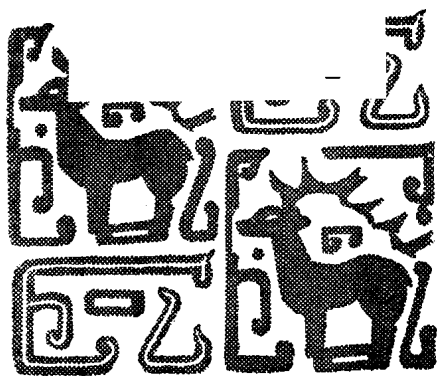


中國思想家論智力





中國思想家論智力

馮天瑜 主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思想家论智力

冯天瑜主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1插页 230,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900

统一书号：7106·1658 定价：0.95元

前言

智力，通常是指人们认识能力的总和。有些学者认为，智力还应包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近代大机器生产出现以后，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长足进步的当代，人的智力愈益对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影响，智力开发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课题。当然，研究智力现象和智力培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往古，公元前几个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在这方面曾留下不少睿智的格言；近代欧洲教育家夸美纽斯、洛克、乌申斯基更高度重视智力训练。就中国而论，从先秦诸子到近现代思想家，对智力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并总结了历代智力培养的经验。学习前哲的这些论述，并给予科学的评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智力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中国探讨智力问题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

中国古代的学术正宗——儒家，走的是一条“贤人路线”而非“智者路线”，他们的视野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工夫，智力很少作为一个专门论题被加以探究。当然，墨家和儒学左翼荀况，以及后世的王充、王夫之等唯物主义者，较直接地讨论过智力问题；即使是那些专门研讨政治、道德问题的哲人，在发挥“修、齐、治、平”之道时，也要不同程度地顾盼“格物致知”之学，其思辨的触角往往也伸抵智力的王国。例如，中国思想家反复论辩的一个古老主题——人性的善恶问题，本来属于伦理学范畴，但在探讨过程中，常常由人性善恶的成因，旁及人的愚智的成因。这实际上就

牵涉到先天素质、后天习染、个人努力诸因素在智力形成中的作用问题。另外，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认识论的丰富思想，包含了对智力结构诸侧面（如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新力、实践能力等等）的描述。至于中国许多古代哲人作为教育家，有关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量力而教、适时而教等教学原则的论述，以及关于教师在智力传递中的作用的论述，更与智力培养直接相关。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很少有智力研究的专门著述，但在经、史、子、集中仍然蕴蓄着智力论的丰富宝藏。

在近代，一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广泛介绍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社会思潮的时候，十分强调“开智”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打破民众愚昧无知的局面。这种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重视智力培养的传统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五四”以后，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其中更包含着启迪民智的内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了智力和智力培养诸问题。当然，由于时代条件所决定，近现代哲人主要致力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研究，不可能对智力问题作系统的、专门性的探讨。此外，“五四”以来的一些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在介绍西方近代智力论的同时，也对智力问题作了一些试验和研究。对于他们这种承先启后的工作，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

至于当代，严格地说，主要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才问题显得十分紧迫，与人才学直接相关的智力培养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说，智力研究在当代中国所受到的重视是空前的，而且这种重视方兴未艾。

我们编辑的这本资料，内容仅限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一些思

想家有关智力研究的论述，其中又以古代哲人的言论为主。“五四”以来现代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著作，以及当代智力研究的成果，则由华中师院同志们编的《智力研究文摘》辑录。

为着检索便利，我们把前哲有关智力问题的论述作了如下分类：

第一，总论。这部分包括四个内容，即：智力的界说，发展智力的重要性，智力发展与德育的关系，智力内部的两个侧面——能力与知识的关系。

正式给智力下定义，是近现代的事情。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施登(W·Stern)说：“智力是指个体有意识地以思维活动来适应新情境的一种潜力。”这段话被现代心理学界认作智力的最早定义。其实，智力现象是从人类产生之日就有的，因此，在十分久远的往古，人类就自觉不自觉地给智力确定界说。我国儒家的创始人孔丘，没有正面给智力下过定义，但他多次论述了“智者”所应当具备的风度，这实际上已经进入智力界说的边缘。以后，墨翟、荀况等人分别给“智”下过定义，这些定义虽然不甚完备、精密，但亦颇有可采之处。

至于发展智力的重要性问题，先哲们主要是从“开智”与富国强兵的密切关系这一角度进行阐述的。先秦诸子就有这种观念的萌芽，而面临深重民族危机的近代思想家，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他们指出：“民智者，富强之原”(严复：《原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康有为等“公车上书”)，“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严、康、梁等人作为不赞同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者，其言论有夸大智力作用的偏颇，但把“开智”与强国联系起来，是一种反蒙昧主义的、有价值的观点。

人类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人的智力的发展与社会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因而“智”与“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渗

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我国历来有着重德传统，尤其是正宗儒学更明确主张把“德”放在首位，而将“智”的发展置于派生和从属的地位。这种将“智”当作“德”的附庸的“重德主义”，在封建时代起过阻碍文化科学事业发展的消极作用；当然，“重德主义”也有积极的社会功效，它与我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不无关系，近人梁启超说，汉奸之才，奴隶之智，不如没有的好。（见《论教育当定宗旨》）便是对“重德主义”积极面的发挥。此外，有些前哲还认识到智对德具有能动作用，“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智者，德之帅也”（刘劭：《人物志·八观》）即是这方面的名言。毛泽东同志更全面地、科学地阐述了智与德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智力内部的两个侧面——知识与才能（能力）之间是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我国古代史论家、文论家曾生动地论述过“才与学”的关系，认为二者缺一不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特别强调能力训练的重要性，他打比方说，培养刺绣工人，不仅要给他提供现成的鸳鸯图形，还要教他掌握金针、制造金针的技能。如此，“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在当代，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提高，出现了“知识爆炸”和“知识陈旧率剧增”的局面，我们更不能满足于让学生仅仅只记住一些具体知识，而应该致力于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人的智力得到健全的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

第二，影响智力形成的诸因素。

智力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内部因素包括遗传（生理素质）、个人的学习与努力、心理特征等等，外部因素主要是指社会环境影响和教育的功能。本书第二部分将介绍中国思想家关于内外诸因素在智力形成中的作用的若干论述。

智力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一直众说纷纭。直到现代，关于智力的成因，仍然有“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这样两种各执一端的理论。尤其是“遗传决定论”，在当今的心理学界还颇有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斯坦莱·霍尔说：“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夸大了遗传在智力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而在我国教育史上，学人们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智力是人的先天素质与社会环境影响、教育作用以及个人努力等多重因素综合而成的。打个比方说，智力是上述因素的“合金”。

我国不少哲学家曾明确指出，人的感官和思维器官提供了认识能力的自然基础，孟轲的“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荀况的“人何以知道？曰：心”（《荀子·解蔽》），便含有这个意思。与此同时，我国思想家更强调环境影响和教育对智力发展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思想史上，“性善论”与“性恶论”这两个壁垒分明的派别，在肯定环境、教育等后天因素对人的品行和愚智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是各派所公认的名论。此外，重视学习、努力对智力形成的能动作用，也是我国许多思想家的共同看法，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得好：“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周易外传》卷四）。

根据对智力成因的较全面的理解，我国一些思想家还对智力“早成”现象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如东汉的王充指出，“早成”儿童并非“神”童，他们不过是有较强的领悟力，而又很早就“多闻见”，并有“家问室学”，幼年即“受纳人言”，这样才“幼成早就”。王充的结论是，“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知。”宋人王安石则在著名散文《伤仲永》中告诉人们，“天才”不足恃，素质良好的人，如果“不使学”，也会降为庸才，“泯然于众人”。

此外，先哲们还注意到意志、兴趣、情欲等非智力因素与人的智力形成的密切关系。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力倡“志于学”、“乐

于学”，引导人们以坚强的意志和浓厚的兴趣致力于智力发展，并主张节制情欲以使智慧增长。

第三，智力结构诸侧面。

人的智力是由感知——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所构成的；另外，注意力对人的观察力、思维力、记忆力的发展有直接影响，也可以纳入智力结构之中。如果用形象的比喻说明问题，注意力是智力结构的窗口，感知——观察力是智力结构的眼睛，记忆力是智力结构的储藏所，思维力是智力结构的中枢，想象力是智力结构的翅膀，创新力是智力结构的关键，实践能力是智力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转换器。我国古代和近代哲人虽然还没有形成智力结构的总体观念，但对智力结构所涉及到的各个侧面，都有相当精彩的描述。

他们曾论及“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肯定了集中注意力对智力发展的作用。

他们提倡“多闻”、“多见”，“好问”、“好察”，把发展感知——观察力作为获智的第一步。有些哲人还提出，要使人的感知——观察力得到发展，须“善假于物”，即借助外力，扩大、加深感官对外物感知的范围。

他们告诫学习者“知而有藏”，加强记忆力；“学而时习”，与遗忘作斗争。

他们强调“近思”、“深思”、“思索以通之”，大力发展智力的核心部分——思维力；并阐述了“学”（掌握知识）与“思”（训练思维力）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关系。

他们倡导“袭故弥新”、“陈言务去”，力主发展人的创新能力。

他们号召学人“躬行”、“践履”，锤炼实践能力，把学、思、行结合起来。

关于想象力，中国教育家所论甚少，而文论家在谈及文艺创

作过程时，对想象力作了生动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智力结构的这一侧面。

第四，智力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自古以来在智力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尤其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承认人的智力差异的前提下，实行“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因而也是有效地发展人的智力；

（二）反对把学习者当作消极被动的知识接受器，主张启发他们学习的自觉性，使其智力活动的诸方面（注意、观察、记忆、思维等等）都呈现一种跃跃欲试的积极主动状态；

（三）“适时而教”、“不陵节而施”，注意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把握智力培养的阶段性和节奏感；

（四）肯定师承的意义，强调长者、教师向幼者、学生传递智力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又引导幼者、学生超过长者、教师，即所谓“当仁不让于师”，“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第五，中国古代的智力检验与测验。

进行智力研究的前提之一，是测定人的智力。而比较严密的智力测验，是近代心理学兴起以后才正式开展起来的。但是，我国古人在社会生活中已产生了检验人的智力水平的需要，并在智力检验方面作了若干尝试。如先秦时的韩非便主张通过“试之官职，课其攻伐”等实践活动，来考验人的愚智；三国时期的刘劭更在《人物志》中提出考查人的智慧、才能的种种办法；此外，我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已出现了测定人的智力的“七巧板”，这早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任何智力测验机巧板。

为了便于读者把握本资料，我们对各节作了简要述评，并对古代和近代哲人论述中比较艰深的字句加了注释；文言文则译成语体文。在作这些注释工作时，参考了有关古籍的注释本。有些古籍字句的解说，历来莫衷一是，我们取其一说。因篇幅所限，

对其他解释未加罗列。

本书由冯天瑜主编，注释工作主要由赵熙文完成，廖全京、余大平也担负了部分注释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局、武汉师范学院党委的指导，北京、武汉和其他地区一些高等院校的专家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这些都是本书能够在短期内编成的条件。由于我们学力有限，兼之仓卒成篇，本书从编排体系、各节内容，到述评、注释、译文，一定多有错漏，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2年2月于武昌

目 录

总 论

- 一、智力的界说..... 1
- 二、“开智”与强国.....14
- 三、智与德.....26
- 四、才能与知识.....45

影响智力形成的诸因素

- 五、先天素质与智力的形成.....52
- 六、后天“习染”在智力形成中的作用.....62
- 七、“好学”、“敏求”与智力的形成和发展.....82
- 八、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发展的影响104

智力结构诸侧面

- 九、“专心致志”、“虚壹而静”
 - 集中注意力与智力形成的关系120
- 十、“多闻”、“多见”，“好问”、“好察”
 - 发展感知力和观察力129
- 十一、“知而有藏”，“学而时习”
 - 加强记忆力143
- 十二、“近思”、“深思”，思学结合
 - 训练思维能力151
- 十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 让想象力张开翅膀飞翔166
- 十四、“袭故弥新”，别开蹊径
 - 培养创新能力172

十五、“躬行”，“践履”

——锻炼实践能力199

智力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十六、智力差异与“因材施教”218

十七、“愤启悱发”，“道而弗牵”

——启发积极思维233

十八、“适时而教”，“不陵节而施”

——智力培养要注意阶段性和节奏感242

十九、师承与智力的传递及发展254

二十、智力的检验与测验275

本书所引典籍作者简介287

总 论

一、智力的界说

我国古代论述智力的专文比较罕见。有关智力的界说，散见于群籍之中。在先秦诸子书里，“智”与“知”往往通用。如《论语》言“知”共一百一十处，其中读作“智”的二十四处。这二十四处“知”（智），全为名词，与“愚”字相对，有智慧、才智、聪明等含义，如“知者不惑”（《论语·宪问》），“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分别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智者的风貌作了论述。荀况更给“智”下了一个颇有见地的定义：“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正名》）认为只有当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相吻合，方可称作“智”；荀况在这里还注意到了智力与才能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墨家则认为，“恕（智），明也”（《墨子·经上》），即当人的认识正确而详明，才可以谓之“智”。荀况、王充等人还指出，正因为人具有“识知”、“辨”、“义”等能力，才成为超越禽兽的“天下贵”。

有些古代哲人还朦胧意识到，智力不仅是一种个人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众人之智，必须顺应历史趋势。如《淮南子》说：“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主术训》），“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原道训》）王夫之认为，“有智慧而无可为之势，则不如乘时者之因机顺导，易用其智慧。”（《四书训义》）这都是很可宝贵的观念。

知人则哲，能官人。

《尚书·皋陶谟》

〔译〕 善于鉴别人才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才善于任用
人。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①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宪问》

〔注〕 ①知，同智。

〔译〕 孔子说：“君子所行的三件事，我一件也没能做到：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

樊迟问知①。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②，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

〔注〕 ①知，同智。②远之：疏远它。

〔译〕 樊迟问怎样才算智。孔子道：“做人的事体，对鬼神只敬重而不迷信它，这可以说就是智了。”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论语·卫灵公》

〔译〕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却没有谈，这是失掉人才；不可以同他谈话，却同他谈了，这是浪费言语。有智慧的人既不失掉人才，也不浪费言语。”

子曰：“由①，诲女②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

〔注〕 ①由：孔子的学生仲由，字子路。②女：即汝，指你。

〔译〕 孔子说：“由，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

〔阳货与孔子〕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

《论语·阳货》

〔译〕 〔阳货和孔子〕在路上碰着了。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同你说话。”〔孔子走了过去〕。阳货又道：“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却听任自己国家混乱而不去治理，这可以叫做仁德么？”孔子道：“不可以。”〔阳货又问〕道：“一个人想做番事业，却屡次让机会错过，可以算得智慧么？”孔子道：“不可以。”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论语·颜渊》

〔译〕 樊迟问仁。孔子道：“爱人。”又问智。孔子道：“善于鉴别别人物。”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子罕》

〔译〕 孔子没有四种毛病——不臆测，不绝对化，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

（“四毋”是一种智者的风格。）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

《周礼·考工记》

〔译〕 智慧的人创造器物，巧匠就照着那样去做。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三十三章

〔译〕 认识别人叫做智，了解自己叫做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老子》七十一章

〔译〕 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最好；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就是毛病。

子曰：“好学近乎智。”

《中庸》

〔译〕 孔子说：“爱好学习，就接近于智。”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

《墨子·经说上》

〔译〕 知材：智力，人们用它来知晓和认识事物，有了它就一定能够知晓和认识。这正象眼睛有明见万物的视力一样。

知，接也。

《墨子·经上》

〔译〕 知晓，是接触事物。

知：知也者，以其知(遇)①物而能貌之。若见。

《墨子·经说上》

〔注〕 ①据孙诒让说，此处为“遇”。

〔译〕 知晓：所谓知晓，是人们用主观认识能力和事物相接